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述要

周文杰[1,2]，杨克虎[2,3]

（1. 西北师范大学 商学院，兰州 730070；2. 兰州大学 循证社会科学交叉创新实验室，兰州 730030；3. 兰州大学 基础医学院循证医学中心，兰州 730030）

摘　要：［目的 / 意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是时代的要求。［方法 / 过程］本文以“范式”理论为基础，对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理论要素进行深入探讨。［结果 / 结论］本文认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特色循证数字人文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集体记忆及其载体，构成了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基础。丰富多彩的传统典籍文献为中国特色循证数字人文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文史互证”指引下具有鲜明中国治学特色的目录学则为循证数字人文自主知识体系打下了厚重的方法论基础。本文所展开的梳理和解析，有望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循证数字人文自主知识体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特色循证数字人文；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G2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248（2022）11-0005-09

引用本文：周文杰, 杨克虎.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述要[J].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 2022, 34(11): 5-13.

1 引　言

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数字人文作为一个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社科研究新领域，尤其需要沿着“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按照总书记 2016 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数字人文自主知识体系，以便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数字人文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为建构具有中国

收稿日期：2022-10-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循证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19ZDA142）

作者简介：周文杰，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兰州大学循证社会科学交叉创新实验室，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信息社会问题。杨克虎，教授，兰州大学循证社会科学交叉创新实验室，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循证医学中心

特色的数字人文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中华文化中特色鲜明的治学传统，在文献资源全面数字化的今天，被赋予了崭新的“循证”使命，从而为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与深邃的优秀治学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具备了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的独特优势。

本研究旨在立足于中华传统文献典籍这一珍贵文化瑰宝中所蕴含的丰富证据资源，借鉴循证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方法与工具，以英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ohn）所提出的“范式”理论为分析工具，从思想基础、文化基础、文献基础、方法论基础四个方面入手，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理论要素展开探讨。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的思想在数字人文研究领域的具体落实，也是自觉遵行“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具体体现。

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当代中国学人的重要学术使命。迄今为止，学者们围绕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问题，已展开了大量研究。例如，辛向阳[1]认为，建构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薛澜[2]对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展开了分析与思考。胡正荣和叶俊[3]针对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创新路径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展开了研究。胡钰[4]分析了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性。韩喜平[5]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进行了探讨。刘国瑞[6]从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创新角度对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进行了解析。刘越男[7]围绕红色基因传承，探讨了构建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张雷声等[8]全面分析了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要素。王义桅[9]论述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信与自觉。杨东和徐信予[10]则针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制定了详细的论纲。针对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人文研究，学者们了展开了一定的探讨。有研究者从新文科建设的视角，论述了数字人文的学科建设问题[11]。也有研究者围绕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就数字人文研究展开的探讨[12-15]。

2 “范式”理论概述

范式（Paradigm）是库恩理论的核心概念。库恩指出，遵循共同的范式是形成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基本特征[16]。范式作为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具有两个特征：一是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研究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二是有许多开放性的问题，以留待研究者不断加以解决。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变量解答的基础[16]。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

“科学共同体”是库恩的“范式理论”中最核心的基础概念。所谓科学共同体，是指在共同范式约束下由旨趣相同的研究者自发组织的一种“社会组织”。在这个社会组织中，其成员遵循共同的研究规则，接受并认可组织内其他成员对每一项具体研究成果的评价。正如库恩所论述的，没有其他专业共同体像科学共同体那样，个人的创造性只向这一专业的其他成员提出，也只由他们来评价[16]。库恩同时认为，范式之于科学共同体的意义在于，一旦接受了一个共同的范式，科学共同体就无须经常去重新考察它的第一原理，其成员就能全神贯注于它所关心的现象中最细微、最隐秘之处[16]。换言之，由于科学共同体相对超然于其他社会组织，因此能够使一个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到它有

充分理由相信它能解决的问题上去[16]。这样一来，在每一个具体的领域或科学问题上，身处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总是处于解决科学问题的最前沿。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科学共同体代表着最前沿问题的研究方向，而其每一项得到确认的研究发现就是对人类社会整体认知结构的最新发展。

本研究中，科学共同体具体指向在数字人文研究中，基于类似的研究素材（如古籍文献）从不同学科视角（如史学、图书馆学、计算科学等）展开探究的那些“认知劳动组织”。从数字人文研究实践的角度看，科学共同体有可能是一个边界清晰的有形组织（如围绕数字人文的某一研究议题展开研究的特定学术机构或团队），也可能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无形组织（如数字人文领域研究者形成的合作网络）。在数字人文研究中，这些承担着不同社会认知任务的有形或无形的科学共同体，共同构成宏大的科学研究系统。从显性的组织形式看，由国家资助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大学及企业内部的研发部门共同构成了社会性的数字人文研究系统；而从隐性的角度看，基于不同师承关系、学术流派而形成的学术交流网络同样是数字人文研究系统的必要组成形式。

数字人文的本质，是对“客观知识世界”的结构加以表征、揭示和再现。客观知识世界一词，源自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所提出的“世界 3”理论。Popper 认为，“世界 3”是思想内容及其物质化而形成的人造产品或文化产品和用语言表达出来而成为固定对象的思想意识，如语言、艺术品、图书、机械设备、工具、房屋、问题、猜测、理论、反驳、证据等等，是客观知识的世界。由此可见，“世界 3”几乎囊括了数字人文的全部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人文是一个借助于新型信息技术以便对“世界 3”加以复现和解析的研究领域。

科学共同体面对数字化的“世界 3”，采用知识计算等手段展开数字人文研究的过程，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群体性社会认知”活动。“群体性认知”一词，源自周文杰等所提出的社会认识层次论。按照这一理论，学术共同体具体承载着促进社会认识高级化进程的任务，而对客观知识世界进行序化整理的图档博机构则是保障社会认识高级化进程的专门的社会性制度安排。数字人文的研究，正是一个以图档博机构及其馆藏资源为基础设施，通过应用新型数智技术手段，对社会认知成果进行再组织、再加工和再发现的过程。

综上所述，“范式”理论、“世界 3”理论和社会认识层次论为数字人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概括而言，数字人文循证范式可被视为旨趣相同的数字人文研究者（即科学共同体）协力推动客观知识世界（即“世界 3”）的还原、复现与解析的群体性社会认识行为。

3 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的思想基础

循证（Evidence-Based），即遵循证据，是一种较早应用于医学教育领域，后被社会科学研究者广泛采用的方法论体系。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循证理念、方法和工具为研究者将学术思想与现场证据相结合提供了基本路径。也就说，通过循证，社会领域的研究者实现了理论与实践、抽象与具象、观念与实在联通互动。前序研究中，本团队已围绕中文文献证据检索的科学性评价[17]，从饱和度[18]、冗余度[19]、信度[20]等角度展开了研究，从而为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的建构提供了基础。

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以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二十大新修订的党章中也明确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堪称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最重要的历史使命。数字人文作为一个诞生于数智时代的新兴研究领域，已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工具和手段之一。

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实现中国之治，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思想养分，以

获得强大思想动力。为此，立足于浩瀚广博的古籍文献，应用大数据技术及知识组织、知识计算等先进的工具、方法、手段，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与精神品格融入中国式现代的历史进程，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正是构建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目标所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中国具体实际为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简言之，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以古籍文献等文化载体为对象，以中华传统文化中蕴藏的独有的精神特质为思想基础，通过应用数智化的循证理论、方法与工具，挖掘传统文化精髓，彰显中华民族品格，提升民族自信，助于民族复兴的一个系统化工程。

4 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的文化基础

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有别于其他任何数字人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这一知识体系蕴含了中华民族丰厚而独特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这一概念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妻子阿莱达·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理论开拓性将人们对记忆的研究从以往的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拓展到文化学领域，从而建立起记忆、文化以及认同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就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而言，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独特民族记忆为其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在文化记忆理论提出之前，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 1925 年就提出了集体记忆理论[21]。该理论认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记忆的场所”是物质或非物质的重要东西经由人们意愿或者时代洗礼而形成的群体记忆遗产。武海霞[22]认为，拥有一种集体记忆，是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必要基础。并提出，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传统文化在实践层面是“活”的传统，是塑造中国人身份的真实力量。当前，传统正在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得到重视。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到 2025 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上述政策文件正是集体记忆在国家层面话语的具体体现。

在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上，阿斯曼夫妇发展了文化记忆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化记忆包括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必不可少且反复使用的文本、图画、仪式等内容，其核心是所有成员分享的有关政治身份的传统，相关的人群借助它确定和确立自我形象，基于它，该集体的成员们意识到他们共同的属性和与众不同之处[23]。按照文化记忆理论，个体的知识当中通过体验获得的成分微乎其微，大部分是通过别人介绍和传递获取的。文化记忆理论在如下两方面特别强调了这些知识的特性：其一，这些知识大多数情况下被赋予了深层次和引申的含义；其二，我们掌握这些知识不是为了眼下具体的目的，而是通过它修身养性和安身立命。文化记忆包括了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不可或缺的表现为文本、图画和仪式的知识体系[24]。

文化记忆一旦进入其载体媒介，则具有了不以原创者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从而成为“世界 3”的具体成份。如上文所述，数字人文循证范式的形成，以“世界 3”为理论基础，对承载着文化记忆要素文献资源等载体加以系统化序化整理，使普罗大众在浩如烟海的文山书海中高效汲取记忆要素。数字人文循证范式得以建构的最终目标，与阿斯曼的理论设想是一致的，即将储藏于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场馆当中的潜在的文化记忆赋予新的社会和历史意义，最终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现时文化记忆[25]。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丰厚而独特传统文化传统及其载体，

构成了建构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基础。

5 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的文献基础

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文献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体是建构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的文献基础。放眼全球，还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能够像中华民族一样将长达数千年文明发展史不间断地付诸于文献等记录资源。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作为几千年中国经验的表述，其时间的跨度正足以说明其生命力[13]。

扎实的文献记录资源基础，为建构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空间。数字人文研究备受诟病的一个短板，就是技术理性下的“计算”，因为丧失了丰富的社会情境因素的支撑，从而失去了人文的本真。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堪称解决数字人文研究上述短板的一剂良药。针对丰富的中国传统文献资源，数字人文研究者不仅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计算”其中的知识要素，也完全可以借助于周边其他资源，还原出计算所得的数字人文知识要素的丰富社会情境。例如，在中国特色数字人文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诗词歌赋与史实史料可相互印证。也就是说，数字人文研究者可以借助于诗词歌赋表征出宏观的社会情境，全方面、立体化体现了古代社会的全景样貌；同时，基于史实史料对历史发展脉络上的关键事件、特征加以计算。二者相结合，就有可以将基于史料而计算所得的数字人文知识要素还原于本来的社会情境之中，从而在保持数字人文计算的科学性的基础上，保留人文的本真。显然，在针对中国古代文献典籍展开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对史实史料加以计算可以提取出中国古代社会的“骨”，而对文学作品所描述场景的表征与复现则显示了古代中国社会的“肉”。二者相互辅助、互为支撑，为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者表征一个“骨肉丰满”“有血有肉”的中国古代社会提供可能。

6 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的方法论基础

对于数字人文研究者而言，循证研究的主要方法论意义在于，通过证据综合（Research Synthesis）提高证据的可靠性、稳定性和可推广性。从医学到社会科学，循证研究的目标都是提高证据在内部理论上的精确性和外部情境上的可推广性。周文杰等认为，循证研究的本质就是提高证据整合的效度。

所谓证据的效度，指研究者所获取的证据在真实情境中的有效程度。证据的效度可分为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在循证数字人文研究中，内部效度具体是指研究者所获得证据链的精确性和完整性，外部效度则指研究者依据证据所概括出一般规律对不同的外部社会情境都有良好的适应性。例如，在针对“鸿门宴”这个历史事件展开的数字人文研究中，研究者按照时间的顺序计算了项羽、刘邦等主要人物及双方兵力部署、政治形势等方面的属性或特征，构造了前后相续的证据链条并对其加以可视化表达。在此项研究中，如果不同时点、各个方面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佐证、严密支撑，则具有较高的内部效度。同时，如果研究者依据证据链概括出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等社会革命的规律性特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中都同样适用，则其外部效度较高。

周文杰等针对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存在的“效度悖论”现象，提出了“循证效度协同”的理念。所谓循证效度协同，是指研究者借助循证的理念、工具与方法，通过对零散的定量或定性原始证据通过元分析（Meta-Analysis）等工具加以整合，从而有效提升其内外部效度，并以系统评价（Systematic Review）的形式对整合后的高效度证据加以报告的过程。与人文社科的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循证效度协同”同样是数字人文领域整合、提高研究内外部效度的关键手段。综上所述，证据综合、元分析、系统评价等循证手段与工具为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者展开循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方法学选项。

上文所述的方法、工具和手段具有一般性，对于任何类型的循证研究都具有参考意义和应用价值，属于循证研究的通用方法。除此之外，中华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学术传统也为构建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具体而言，中国目录学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独特的方法基础。

郑建明认为，中国目录学以图书、文献、目录等各种要素及其关系作为学科内容，以文献工作包括著录、编排、组织等和文献分类、目录编撰、文摘、索引方法等为实践内容[26]。柯平指出，目录学在古代中国称之为校雠学，是辨章学术之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27]。

总之，与循证领域的通用方法相类似，基于中国目录学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同样能够实现兼容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从而有助于基于文献的循证效度协同，实现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之间的“循证效度协同”。与此同时，在中国目录学及中华文化中特有的“文史互证”等学术传统的支撑下，基于中国文化情境而发展起来的数字人文循证范式天然地具有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个性特征。通用方法与特有传统的结合，为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7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8]，“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29]。在“四个自信”的关系问题上，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5 000 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30]。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数字人文循证范式的建构，是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本文立足于科学哲学家库恩而发展的范式理论，从“科学共同体”的理论属性入手，解析了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文献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本文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特色循证数字人文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集体记忆及其载体，构成了中国特色数字人文循证范式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基础。丰富多彩的传统典籍文献为中国特色循证数字人文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文史互证”指引下具有鲜明中国治学特色的目录学则为循证数字人文自主体系打下了厚重的方法论基础。

总之，构建中国特色循证数字人文自主知识体系，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也是对优秀的文化基因进行保护性开发的必要前提。在数智化时代，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循证数字人文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有助于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对向世界提供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传承、文化记忆解决的中国方案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面对厚重的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包括典籍、简牍等宝贵的文化遗产，应用新型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基于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方法，展开深入的数字人文研究，不仅恰逢其时，而且势在必行。为此，数字人文领域期待更多基于传统文化资源而展开的历史、文学、社会诸方面研究，也热切呼唤着具有中国特色循证数字人文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 辛向阳. 建构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2, 11(6): 7-9.

XIN X Y. To 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profoundly grasp the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of Xi Jinping'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J].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view, 2022, 11(6): 7-9.

[2] 薛澜. 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分析与思考[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2, 11(6): 15-16.

XUE L.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public management: Analysis and thinking[J].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view, 2022, 11(6): 15-16.

[3] 胡正荣, 叶俊. 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创新路径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J]. 中国出版, 2022(20): 3-10.

HU Z R, YE J. Innovation path of "three systems" of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J]. China publishing journal, 2022(20): 3-10.

[4] 胡钰. 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性[J]. 青年记者, 2022(19):78-79.

HU Y. Practicality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Youth journalist, 2022(19): 78-79.

[5] 韩喜平.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必然与路径探索[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9): 23-32.

HAN X P. Historical necessity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J]. Studies on Marxism, 2022(9): 23-32.

[6] 刘国瑞.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创新[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9): 75-82.

LIU G R. Macro-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ng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J].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2(9): 75-82.

[7] 刘越男. 传承红色基因 努力构建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J]. 中国档案, 2022(7): 19.

LIU Y N. Inheriting red genes and striving to build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archival science[J]. China archives, 2022(7): 19.

[8] 张雷声, 韩喜平, 肖贵清, 等. 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 8(7): 4-16.

ZHANG L S, HAN X P, XIAO G Q, et al. Constructing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Studies on Marxist theory, 2022, 8(7): 4-16.

[9] 王义桅.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信与自觉[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5-24(01).

WANG Y W. Confidence and consciousness in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N].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2-05-24(01).

[10] 杨东, 徐信予.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论纲[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2, 36(3): 7-10.

YANG D, XU X Y. Constructing the outline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J].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22, 36(3): 7-10.

[11] 祝蕊, 刘炜. 新文科与数字人文学科建设[J]. 图书与情报, 2021(5): 53-59.

ZHU R, LIU W. New liberal arts and digital humanities[J]. Library & information, 2021(5): 53-59.

[12] 张云中, 焦凤枝, 刘嘉琳. 唐三彩数字文化资源展示的语义描述模型与元数据框架[J]. 图书与情报, 2021(3): 87-96.

ZHANG Y Z, JIAO F Z, LIU J L. The semantic description model for the display of Tang tri-color digit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metadata framework[J]. Library & information, 2021(3): 87-96.

[13] 夏翠娟, 贺晨芝, 刘倩倩, 等. 数字人文环境下历史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模式新探[J]. 图书与情报, 2021(1): 53-61.

XIA C J, HE C Z, LIU Q Q, et al. New exploration on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mode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sources in the digital human environment[J]. Library & information, 2021(1): 53-61.

[14] 王丽丽, 张宁. 数字人文视角下的古籍知识关联探析[J].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 2022, 34(9): 51-59.

WANG L L, ZHANG N. An analysis of knowledge correlation of ancient 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y[J].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agriculture, 2022, 34(9): 51-59.

[15] 魏晓萍. 数字人文背景下数字化古籍的深度开发利用[J].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18, 30(9): 106-110.

WEI X P. Deep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digital ancient book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humanity[J].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agriculture, 2018, 30(9): 106-110.

[16] 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 4 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8.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4th edition)[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8.

[17] 周文杰, 赵悦言, 魏志鹏, 等. 循证视角下文献证据检索的科学性评价: 缘起、指标与趋势[J]. 图书与情报, 2021(6): 31-36.

ZHOU W J, ZHAO Y Y, WEI Z P, et al.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literature evidence retrieval 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idence-

based research: Initiation, index and trend[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2021(6): 31-36.

[18] 魏志鹏, 周文杰, 杨克虎. 循证视角下文献证据检索的饱和度与冗余度研究: 基本理论与基础数据[J]. 图书与情报, 2021(6): 37-44.

WEI Z P, ZHOU W J, YANG K H. Research on saturation and redundancy of documentary evidence retriev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idence-based I: Fundamental theory and basic dataset[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2021(6): 37-44.

[19] 赵悦言, 魏志鹏, 周文杰, 等. 循证视角下文献证据检索的饱和度与冗余度研究: 实证检验[J]. 图书与情报, 2021(6): 45-51.

ZHAO Y Y, WEI Z P, ZHOU W J, et al. Research on saturation and redundancy of documentary evidence retriev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idence-based II: An empirical tes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J]. 2021(6): 45-51.

[20] 卢洁妤, 魏志鹏, 周文杰, 等. 文献证据检索的信度研究: 基于循证视角[J]. 图书与情报, 2021(6): 60-68.

LU J Y, WEI Z P, ZHOU W J, et al. Research on reliability of documentary evidence retrieval: Based on evidence-based perspectiv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2021(6): 60-68.

[21] HALBWACHS, MAURICE. Das kollektive ged chtnis[M].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5.

[22] 武海霞. 集体记忆是凝聚力的基础[J]. 博览群书, 2017(11): 10-15.

WU H X. Collective memory is the foundation of cohesion[J]. Chinese book review monthly, 2017(11): 10-15.

[23]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JAN A. Cultural memory: Writing, memor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early high culture[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24] 金寿福. 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J]. 外国语文, 2017, 33(2): 36-40.

JIN S F. Jan Assmann's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J].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2017, 33(2): 36-40.

[25] ASSMANN J, CZAPLICKA J.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J]. New German critique, 1995(65): 125-133.

[26] 郑建明. 着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发展[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8-02(08).

ZHENG J M. Focus on promoting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N].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2-08-02 (08).

[27] 柯平. 目录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2.

KE P. Bibliography[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22.

[28] 人民网. 如何理解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EB/OL]. (2021-04-22)[2022-12-3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7707812770626646&wfr=spider&for=pc.

People's daily online. How to understand that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s more basic, broader and deeper self-confidence[EB/OL]. (2021-04-22)[2022-12-3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7707812770626646&wfr=spider&for=pc.

[29] 秦宣.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EB/OL]. (2013-01-16)[2022-12-31].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116/c49150-20216613.html.

QIN X. Strengthen the road self-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oretical self-confidence and institutional self-confidence[EB/OL]. (2013-01-16)[2022-12-31].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116/c49150-20216613.html.

[30] 中国网. 必须毫不动摇坚定文化自信 [EB/OL].(2022-07-13)[2022-12-3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8199176295104670&wfr=spider&for=pc.

China net. We must unswervingly strengthen our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B/OL]. (2022-07-13)[2022-12-3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8199176295104670&wfr=spider&for=pc.

An Overview of the Evidence-based Digital Humanity Paradig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ZHOU Wenjie[1,2], YANG Kehu[2,3]

(1.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2. Cross-innovation Laboratory of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30; 3. Evidence-based Medical Center of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3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t i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present times to build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evidence-based digital humanistic paradig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World 3 theory developed by Popper, this study defines the esse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as representing, revealing and reproduc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objective knowledge world.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paradigm theory developed by Kuhn,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basic theoretical elements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evidence-based digital humanities paradig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paper, the carding of the elements of evidence-based digital humanities theory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That is to say, the research that adheres to the evidence-based ideology and method of digital humanity is identified as the same research community,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evidence-based digital humanities will build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future. [Results/Conclus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evidence-based digital human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its carrier constitute the cultural basis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The rich ancient literature works have laid a solid literatur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evidence-based digital human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utual evidenc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bibliography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has laid a solid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vidence-based digital humanistic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contex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building an evidence-based digital humanitie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not only be benefitial to improving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have an obviou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providing the world with a distinctiv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memory solutions. In the face of the massiv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resources, especially the precious cultural heritage including ancient literature works, it is not only timely but also imperative to apply emerg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learning and related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carry out in-depth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conducted by this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benefi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vidence-based digital humanitie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evidence-based digital huma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theoretical basis